

# 联邦德国现代哲学的主要倾向

〔联邦德国〕 W. 克卢克森

**一、非封闭的哲学概念** 要描述德国哲学的现状，并非易事。德国虽然有许多“好的”哲学家，但却没有能够驾驭整个〔哲学领域〕的杰出的思想家。在哲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兴趣之间虽然有着明显的、甚至原则的区别，但却不存在自成一体的、其对立性足以代表整个哲学研究的学派和方向。因此，就难以勾画出划分学派的略图。但是，每一个哲学家都愿意同任何一个哲学家就一切哲学活动进行讨论式的对话。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的统一性，而恰恰表明对立的立场在对话中清楚地显示出来，表明哲学家是互相持批判态度的。同时，要举出所有哲学家在思想上的共同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这就是所谓“交往的共同点”的前提条件，那么，这里就恰恰缺少这个前提条件。实际上也不存在一个能得到大家承认和被大家使用的共同语言。但可以断言，参加对话者学会理解众多的哲学语言并能掌握和使用这些语言。事实上，分析哲学家和辩证法学者、先验哲学家和解释学家，在互相批判中，不仅相互划清界限，而且也相互借鉴，相互承认对方为哲学工作的同事。

这并不是说，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不定型的哲学战场，而是说，我们不可以用对康德到黑格尔那个时期合适的方法来描述当今的状况。当时有许多相互竞争的体系，它们都提出了全面的和无条件的价值要求，但它们同时也被评价为所谓“伟大的”思想家的（即按艺术作品的方式的）原始构思。于是，关于哲学必须在一个绝对知识的体系中完成的思想就在黑格尔那里变成陈旧的了。但是，无条件的价值要求在后来的批评家那里并未消失，尼采甚至海德格尔也提出了这种要求。今天，规范的哲学已不再包括这种要求。具有能够避免批判的知识“终极的”和不能更改的知识的要求，不再属于这个价值要求。同时，在这个要求中清楚地表明，如果哲学的“全部”要求是消极的，那么，它也只能在个别的意义上得到满足，实际上并不存在哲学的完成。

这并非是说，哲学必须放弃“总的”方向。确切些说，哲学并未放弃总的方向，因为哲学问题一般是朝向总的方向的。就是价值要求也没有因为放弃绝对性而相对化；相反，价值要求得到了强调，并且也被人们加以讨论。最后，哲学没有希望得到完成，并不能成为人们悲观失望的原因。相反，人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的部分认识，在一个非封闭的领域里，成了人们发现真正研究领域的动力。

对哲学做这种的理解，当然并不仅仅是德国人；在人们严肃对待经验的地方，一般都认为哲学是一个最终的、多元的、在多样性中实现着的活动。但这种活动在德国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经验的结果。它的背景是强调系统的或者绝对的价值要求的主观主义哲学的终结。研究这一背景，即进行历史性的研究，就成了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这也是德国哲学研究的主要

---

Wolfgang Kluxen 博士系西德波恩大学哲学教授，曾任联邦德国哲学总会会长六年之久。他是研究中世纪哲学的专家，对现代德国哲学也有较全面的了解。本文是他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邀请于今年9月在京讲学的讲稿。——译者注

部分。当然，这里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人们消极地与之划清界限的思想。非封闭的哲学概念也涉及历史上出现的哲学形态，就它证实的思想的经验来说，它具有真理的机遇。历史性的工作在这方面具有直接的哲学意义，它在这个意义上对哲学讨论发挥着影响。

在德国，对传统哲学的研究，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曾占主导地位。另外，一个新的、具有长远影响的研究方向，在六十年代中叶出现，即转向迄今仍被忽视的实践哲学研究。如果说，到此时德国哲学中杰出人物当数海德格的话，那么，现在，“批判理论”和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原因是西方世界意识中的价值观念起了变化，它的象征即是大学生的“文化革命”。但实践哲学兴起的过程，不可仅仅理解为是对历史事件的回答。这个过程包括了所有的哲学方向，如果谈起战后德国哲学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话，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兴趣的转变，而宁可说是哲学兴趣的发展。

哲学兴趣的进一步发展，导致有英国血统美国人接受了科学哲学，而这正构成了德国战后哲学的第三个阶段。当然，这不是说接受这种思想是根本性的。确切些说，接受这种思想是人们的意识有了发展的结果：在技术上世界发生了变化，从本质上说，日益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制约的结果，即，科学是对探讨意识和意义的反思思维提出问题和对它的挑战。在这方面，不仅认识论的学说是重要的，而且对实践的考察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文明下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德国哲学的“科学阶段”绝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过程。它是德国哲学的第三个主要倾向，同上述两大倾向一样具有全面的意义。下面我对各个主要倾向分别加以阐述。

**二、历史性的方向和解释学** 德国大学哲学(即职业哲学家)的特点是重历史研究。其原因可到黑格尔以后德国哲学的发展中去寻找。大家知道，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性价值要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专门科学的进步超过了一切具体的见解并使总体仅仅成了一种“思辨”。因此，最有成效的提出反对体系的、自治的价值要求的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反对体系强迫，要求实现有限的实际的权利和个人权利的批判的历史学。结果，人文科学成了哲学所遵循的模式。这是为了宣布自己是“科学”。各个学院和系恰恰承认哲学史学家是“得到科学证明的”；至今，学院哲学家大部分还是把历史证明看作哲学水平的标准。从人文科学意义上说，哲学史学家必定是“有学问的”。

在古典教育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古代哲学研究占据优势。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近代哲学成了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如上所述，对人们扬弃的主观主义哲学的背景，需进行历史考察。根据今天哲学史批判的标准，对德意志传统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思想家，主要有尼古拉·冯·库埃斯(Kuec)、莱布尼茨、费希特、黑格尔、雅克布和谢林，但出版家的兴趣也会引起人们注意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章。从人员和财力的情况来看，出版物是哲学研究开支的主要项目。从动机上来说，出版界也存在着保持德国传统的兴趣，德国哲学家理应在这方面对国际哲学研究作出贡献。

从哲学上来看，不可仅仅把人文科学上的文章评价为历史的、过去的生活的表述，好象它仅仅是资料，而应赋予它内容上的阐述(它已提出价值要求)以现实意义。如果历史学表明，传统处于不同于我们的理解水平上，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介绍，就是把不同的水平“溶合”在一起。这就是解释学的目的。解释学的前提和设想是，解释的主体不能被想象为抽象的主观，而是在广泛的传统的历史联系中自我体验，在语言史发展的主体通性中，即在生命时间的连续性中、存在的世界中自我体验。这里，本来的历史观点不能否定，而是给以反

思。正是因此才可以提出价值要求，才可被其他观点所承认，并在大家承认的范围内得以合法化。

作为哲学方法的解释学不直接涉及一个客观的对象世界，而是涉及一个已经理解了的世界。但是，如果世界本身只是在理解中，才是可以认识的，如果谈到“存在”，不能不谈它同“意义”的关系，那么，解释学也可以提出“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的学术圈子里，解释学是同现象学连在一起的，因此，解释学对“事物本身”的解释，也就变了样。同样，〔海德格尔〕接受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解释”，被〔他〕认为是理解的世界存在中的历史方式。同先验哲学最终的理由解释相反，解释学将自身理解为对以主观和客观的对立为出发点的主观主义哲学的扬弃。反思的历史性最终作为“存在”可以同化那种作为存在哲学动机的永不过时的主体意义。因此，解释学可以变成“万能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似乎与它的理论是矛盾的。

人们有理由这样展望：甚至未来，解释学仍将是哲学研究的一个主导倾向。但这不是因为解释学具有万能的能力，而是因为它作为哲学方法具有解释历史的力量。在“非封闭的”哲学概念标志下，在思想史的联系中，反思地掌握本来的历史性是必然的，这也正是解释学的任务。

**三、向实践和规范讨论的转移** 向实践哲学转变的原因除了一定的历史事件外，更多的是由于一般的社会意识的转变，在技术进步、实践进步以及实践的“科学化”的标志中，就会不再满足于传统上起作用的规范和习惯，而是提出讨论并要求加以阐明。从此，在联邦德国产生了对含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道德问题的公开讨论。哲学家们参加了这场讨论，但并不一定是起了主导作用。在职业哲学中，这个题目已被承认是必要的。

从根本上说，人们要求的是合理的论证。因此，合理性就成了善良行动和正确规范的条件。此外，基本点还在于道德的行动理性不可和技术世界的目的合理性（即“工具理性”）等同。说得更精确一些，就是把交往行为、战略行为和技术行动加以区别。根据这个划分的代表人物的看法，在交往行为中出现的只可能是真正的人性。在这里已不再涉及外加的目的，而是人本身的实现，是传统上所说的爱和正义，或者如某些人现在喜欢说的，是交往和解放。

因此，实践哲学不仅在人的存在赖以实现的实践中有其出发点，而且有其起主导性作用的终点。实践哲学涉及社会现实本身中人们所需要的、当然也是受到危害的道德概念，是一切人都应该具有的人权和人的尊严、自我实现的自由和生存的机遇。这就是启蒙的思想，它首先通过康德的思想固定下来。康德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人决不仅仅是作为手段，而始终是同时作为目的本身加以看待，这个原则已被人们所接受。人们一致的看法还在于，道德的自主性在民主的法制国家中似乎有其政治上的总的规则。

在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理想的主导思想之间的领域中，统一性主要在于合理的论证该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价值观念的差异是应引起关注的，它往往起始于对当今社会制度的评价。极端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即认为这个制度还富有活力和有保留的价值（当然也需要对它进行改进和控制，需要同它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并且要求变革“制度”，当然，大都采用口头上的激进方式。在这方面，争论涉及更多的是战略-技术问题，而不是实质性的道德观。哲学的专业界限常常会被越过。

从哲学的专业意义上说，这里可以举出许多细节来。因为关于实践哲学的论文是如此之多，以致于它仅次于历史性的论文而占了哲学出版物的多数。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哲学著作

的风格首先由于在规范讨论中有悠久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的（即分析哲学的）伦理学的影响，同时也因社会科学的影响而起变化。从内容上来说，其结果正是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行为哲学的发展。关于理论和实践的讨论，揭示了两面性的关系，这对科学观念来说是有后果的。从一定的兴趣出发，也产生了关于“最终的论证”的讨论。其意义即是对康德的主观哲学理论的扬弃。至少，这个讨论清楚地表明，通情达理的理性不一定非得思考为主观的理性，而应思考为交往的、生命世界共同的和在语言上时兴的理性。

理性概念的精确化和扩展也许是向实践哲学转移的最重要的结果。同样清楚的是，不断前进的现实的实践不允许结束：这里涉及一个根本不可能结束的发展倾向。

**四、科学和技术世界** 就科学是唯一的裁判来说（科学知识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几乎是无限的），“科学”这个论题，在我们的世界上同“实践”的论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战后德国哲学从转向实践继之而来的是对高度发达的盎格鲁萨克逊的科学论的接受，这并非偶然。但应该看到：严格的认识论的著作，虽然得到了承认，但在德国哲学界却并没有后继人。相反，科学批判，甚至历史的论证性的批判，却仍在发挥作用，甚至，这些批判也对使自身明显地得到了深化的德国理论进行批判（H. 布鲁门贝格语）。

至少可以说，今天，在我们谈到的理论和批判的知识中，人们正在从哲学上研究科学。德国的特点是在同实践哲学的联系中，批判地研究社会科学。当然，这里涉及更多的是社会科学同规范性的关系，少数是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的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争论是关于价值判断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同关于理论和实践的讨论相联系的，而理论和实践的讨论又将科学估价作为改变世界的力量。科学的社会结果即“技术世界”是中心问题。

技术哲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服务的，它的特征是分析的，又是规范的。但自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可怕后果以来，整个问题的复杂性又获得了新的内容。问题的核心是生态学，即人同自然的关系问题。人在自然中并依赖于自然而生存在一个人们应在概念上予以充实的地球上。就科学从理论上支持了那种包揽和掠夺地球的技术来说，它作为发展的起源是可以予以阐明的，而发展的直线延续将会导致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的消亡。因此，技术-科学理性本身的现实之扬弃，看起来是可能的。于是就提出了合理性的问题，因为合理性的现实实现的过程导致合理性本身的结束，也就是导致非合理性。

这对哲学来说，当然是一种挑战。哲学的回答首先是提出了一种“生态伦理学”，它的基本问题就是重新确定人和自然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现在已引起争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要看一个相应的对合理性的解释是否成功。对于这个具有高度紧迫性的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理性，即从必须加以控制的发展本身的前提出发。显然，这里出现了一个在今后将继续发展的哲学倾向。

**五、结束语** 我在这里提出的线索，当然只是画了个粗略的轮廓，只是纵断面的一部分。但当我将上述三大倾向解释为现代德国哲学的需要特征时，我可以断言，大部分德国哲学家是赞同的。我也相信，理性或者合理性问题的主要作用，大部分人是认可的。我还想补充说明的是，多数人认为语言的主体通性中的合理性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汇集了分析哲学家、解释学家、交往理论家和生命世界的现象学家。在这个领域中，哲学的反思可以指导一场终极而有效的讨论。这场讨论在它的范围内的成功并不依赖最终论证或者体系的成功。同时，它不需要放弃总体问题，相反，它可以在非封闭的哲学概念下，使大家都来讨论总体的问题。

（李忠尚译）